

# 河西汉晋简牍及其学术价值

高 荣

(河西学院历史系,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 要:**河西简牍是指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居延、玉门、武威等地出土的简牍。河西简牍的年代上自西汉,下迄西夏,前后延续一千二三百余年,其中主要集中在汉晋时期。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邮驿交通和民族关系等诸多领域,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汉晋时期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简牍学;武威王杖简;武威汉代医简;悬泉汉简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07)01—0060—06

河西走廊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自汉代以后(尤其是汉唐时期),始终是中原王朝重点经营的地区。当地特殊的气候条件,使许多珍贵的简牍材料得以保存下来。自20世纪初发现敦煌汉简以来,在河西各地发掘出土的简牍已有54000多枚,其时间上自西汉,下迄西夏,前后延续一千二三百余年,其中主要集中在汉晋时期。这些材料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邮驿交通和民族关系等诸多领域,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汉晋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经过几代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以简牍帛书研究为内容的简牍(帛)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堪称继甲骨学和敦煌学之后的又一国际显学。而中国近代的简帛研究,则以敦煌和居延汉简为嚆矢。其中1949年前,仅限于尼雅、楼兰、敦煌、居延等西北边塞烽燧和古城遗址出土的一万余枚汉晋简帛文书,内容主要属于屯戍行政文书档案,所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较大的局限性。1949年以后,特别是从8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sup>[1]</sup>现将一个世纪以来河西简牍的发掘整理及其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作简要介绍。

## 一、河西简牍的发现及其主要内容<sup>[2],[3],[4]</sup>

河西简牍的发现始于1907年。是年,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西北的汉代烽燧遗址中

掘得汉晋简牍708枚,其中纪年简166枚,最早者为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最晚的是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

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先在疏勒河流域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掘获汉简84枚。随后又在安西(今瓜州)、酒泉等地的汉代边塞城障和烽燧遗址中掘得汉简105枚。陈梦家先生将其称为“酒泉汉简”,但一般在习惯上仍称其为“敦煌汉简”。

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西北古玉门关城(即小方盘城遗址)外的沙滩中上掘得汉晋简牍17枚,所记内容为屯戍事务,且均为残册,具体地点、方位不详。

1927年10月,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成员黄文弼在额济纳河畔的葱都尔获得汉简3枚。

1930—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次进入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察期间,瑞典人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地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先后掘获10200枚,其中大部分是木质简牍,也有少量竹简。因其数量巨大,内容繁多,轰动了学术界。

1944年,由向达、夏鼐、阎文儒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对敦煌小方盘城及其以东的汉塞遗址进行考察发掘,共获有字汉简49枚。图版和释文见夏鼐《考古学论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汉简出土情况见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载《社

收稿日期:2006-09-18

作者简介:高荣(1966—),男,甘肃高台县人,历史学博士,河西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河西地方史与简牍学。

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1987年第1期）。

1957—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磨嘴子清理发掘了37座汉墓，其中1959年发掘的一座属于新莽时期的小型单室双棺墓（即6号墓）中出土了600多枚竹木简，多数为木简，只有少量竹简。木简有长简和短简两种，均以松木制成。长简内容为《仪礼》，简背均书有顺序号，可分为甲、乙、丙三种版本，共有9篇。其中甲本7篇所署篇题和篇次与今本、两戴本和刘向《别录》均不尽相同，很可能是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后仓、庆普本。该简本是墓主人生前习诵教授用的抄本，抄写时间不晚于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年）。同墓出土的短简共有9枚，内容为日忌杂占之类，其中一枚上书“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由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传授礼经的专家。<sup>[5][6]</sup>

1959年秋，甘肃省博物馆还在18号汉墓出土了一枚鸠杖和10枚“王杖简”，称为“王杖十简”。简文隶体墨书，字迹清晰，设有三道编绳，内容为王杖诏书册。<sup>[7]</sup>1981年9月，甘肃省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从当地农民手中收得一份被认为与“王杖十简”出于同一墓区的“王杖诏书令”简册共26枚，有两道编绳痕迹。册书用汉隶书写，每简背面都有编号，除“第十五”号缺佚外，其他均保存完整，故可推知原册书应有27枚简组成。该简册内容包括5个关于尊敬高年、抚恤鳏寡孤独废疾者的诏书令。册书所录诏令，最晚为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其书写时间当在元延三年或稍后的成、哀之际。<sup>[8]</sup>

197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武威汉滩坡汉墓中清理出竹木简牍共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其内容为医药方，故称“武威汉代医简”。现存比较完整的医方有30多个，多为一病一方，包括现在意义上的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和针灸科等，如“治伤寒遂风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等，内容涉及今之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等。所记药物近百味，其中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这批医书简牍是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卫生和医学理论的重要资料。<sup>[9]</sup>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和武威县文化馆将其整理编为《武威汉代医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2—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三处汉代不同类型的遗址进行发掘，共掘得汉简19637枚。除少数采自地面和扰土中者外，大多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其中甲渠候官第四燧遗址共出土木简195枚，简文主要有诏书、囚律、爰书、历书和有关天文的内容。从所出封检、簿检和文书中多有第四燧、第四候长某某治所等情况，可推知其地

即甲渠候官第四燧所在，同时也是第四部候长的治所。其所出纪年简，上限不早于汉昭帝始元年间（前86—前80年），最晚者到西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这些简牍可编联的册书达340多册，其中有46册完整的文书。在肩水金关遗址，共掘获简牍11577枚。甲渠候官和第四燧出土的简牍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分别由文物出版社（1990年）和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前者名为《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和第四燧》，仅有释文，无图版；后者名为《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不仅公布了甲渠候官和第四燧遗址出土简牍的释文和图版，而且增加了1972—1982年间在居延地区复查时所获简牍的释文和图版。肩水金关遗址所出近12000枚简牍的释文整理也已结束，但尚未正式公布、出版。

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酒泉西北约70多公里的玉门花海农场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中掘得木简91枚，另有无字素简12枚。较为重要的有“武帝遗诏”和《苍颉篇》。这批简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历史和文字学，提供了新的材料。

1979年7—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的汉代长城调查组，在敦煌西北95公里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土了1217枚简牍，绝大多数为木简，竹简极少。纪年最早者为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最晚的是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其中平帝至王莽时期的简占一半以上。<sup>[10]</sup>

1981年3月，敦煌县文化馆得知当地农民在酥油土以北的汉代烽燧遗址发现4枚汉简的消息后，即派人赶赴现场调查，又采集到汉简76枚。<sup>[11]</sup>这批汉简均为木质，且多以当地所产的胡杨、红柳为材料。内容大致有诏书、律令、檄书、屯戍簿、字书、兵书、历书、私人信件等，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符、封检、削衣等。只有一枚西汉昭帝始元七年（前80年）的纪年简，但据其它简牍的朔闰干支推算，其下限可至王莽时期。

198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市韩佐乡五坝山发掘3号汉墓时，出土一枚长25厘米、宽7厘米的木牍，两面书写，内容为墓主死事文告。

198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市松树乡上畦大队汉滩坡19号晋墓中，出土了5枚木牍。其中有“升平十三年”纪年简，“升平”为晋穆帝年号（公元357—361年），则该简亦当在此时（时河西为前凉张氏所据）。简中内容有墓主纪事文书和随葬物清单。

1986年，高台县文化馆在本县罗城乡常封村晋

墓中,获得木牍1枚,木牍长23.6厘米、宽4.5厘米。其上残存文字甚少,或为书信之类。同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居延肩水候官治所地湾城(A33)遗址发掘出土1000多枚汉简。

1979-1989年间,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过程中,先后在12个地点陆续采集得汉代简牍147枚。<sup>①</sup>

1989年8月,甘肃省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在武威柏树乡下五畦大队旱滩坡东汉墓中,获残简17枚。其中有“建武十九年”纪年简,故可断定其时间在东汉初。简文所记为诏书令的若干条款,内容为优抚高年和残疾人的诏令,也涉及度田、户口管理和保护农耕等,其主旨与武威磨嘴子汉墓所出《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大致相类。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汉代悬泉遗址发掘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3000余枚。以木质简牍为主,竹简很少,另有帛书、纸文书和墙壁题记。这是继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发掘居延汉简之后河西边塞的又一次重大收获,被评为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就其形制而言,悬泉置所出简牍也包括简、两行、牍、觚、封检、楬、削衣等类型。简牍所见册书约有50多部,用两道或三道编绳编联。或先编后书,或先书后编;有以简札编联成册者,也有用两行编册者;有简札、两行合编为一册者,也有简札与木牍混编成册者。纪年简中最早者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者为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简牍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大量诏书律令、各级官府的往来公文(包括司法文书和簿籍等)、私人信件和文化典籍等。

## 二、河西简牍的学术价值<sup>②</sup>

河西简牍不仅数量繁多,分布地域广泛,而且其内容也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化、邮驿交通、丝路贸易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可以补充和纠正文献记载的缺漏和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现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第一,利用河西简牍材料,有助于校正和订补传世文献的讹误。我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传抄、刻写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许多传世文献都存在一些错误和缺失。流传于今的“十三经”本《仪礼》,由于“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sup>[12]</sup> (卷二〇“经部·礼类二”,《仪礼注疏十七卷》,p159)故最为难读,错误亦多,给阅读和研究带来极大不便。借助武威磨嘴子

汉墓出土的《仪礼》简,不仅可校订今本的错讹衍漏,而且为研究汉代经学和古文字学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新材料。如今本《士相见之礼》之“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士则曰寡君之老”句,上下文矛盾,难以训释。清代学者解释各异,均未得其要领,今以简本校之,知“士”为衍文,问题始得以解决;至于简本与今本在字、词和词组方面的歧异,更多达305处之多。其中的有些字,既不同于今文,也不同于郑注中所说的古文,这对于研究古文字学尤其是汉代通用的隶书,提供了绝好的材料。<sup>[13]</sup>还有,简本《服传》颇异于今本,是两汉时期《礼经》全经别行,又与《丧服》单经并行的单传本。马融初入东观典校秘书时,把它与单经合编,成《丧服经传》一卷,并撰注单行,晚年撰《三礼》全注,合于17篇之中,以后郑玄等相继撰注,郑本流传至今。<sup>[14]</sup>因此,武威《仪礼》简的发现,对研究汉代礼经传习和古书形成十分重要。

《淮南子·天文训》云:“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对于其中的“二月建卯”之说,几乎所有的注疏家都未提出异议。但裘锡圭先生认为:“斗杓正月建寅,咸池建卯不言正月而言二月,颇为可疑。”他根据《淮南子·天文训》中“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之说和敦煌汉简中“正月大时在东方舍卯,小时并在东方舍寅”<sup>③</sup>的记载,指出:“斗杓所指之辰即月建。所以简文与上引《天文》篇讲的是一件事。简文说正月大时舍卯,可证《天文》篇‘二月建卯’之误。大概后人不明大时小时之说,以为正月建寅与正月建卯矛盾,所以把第二个‘正月’改作‘二月’。”<sup>[15]</sup> (p150)此说甚确。

第二,可订正许多史书记载的错误,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为某些含混不明或相互矛盾的记载提供有力的证据,具有补史、正史和证史的功用。如《墨子·备水》、《韩非子·八说》等篇中屡见有“有方”一名,但其究为何物则不详。清人孙诒让认为“有方”当为“酉矛”之讹,洪颐煊则以“方”为“刃”之讹,今人或将“有方”释为执军旗者,或径将“方”字改作“弓”字,<sup>[16]</sup> (p982-983) [17] (p223)都是错误的。王国维先生将《墨子·备水》、《韩非子·八说》的记载与敦煌汉简相结合,认为有方与弩、矛等并举,故亦为兵器,“唯其形制则不可考矣。”<sup>[18]</sup> (p179)劳榦先生对文献记载和简牍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有方为戈戟之类兵器的结论。<sup>[19]</sup> (p51)其说颇可采信,前述裘锡圭先生文对此已有论述,故不再赘言。

文献中关于汉代法制史的资料非常缺乏，至于“爰书”为何物？其内容、格式如何？更无从知晓。河西出土的汉简有许多“爰书”，正可填补这一领域的资料空白。如居延新简中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是当时居延地区一件民事诉讼案的原始卷宗，其中详细记述了案件始末和验问判决过程，对补充、研究汉代的法律和司法程序等具有重要价值。该册不仅阐明了汉代治狱鞠讯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而且初步解决了过去存在争论的汉代边郡地区民政与军事两大系统的职权关系问题。<sup>[20]</sup>再如，关于汉代边塞防御系统和组织管理、烽燧布局与烽火制度、邮驿机构及其职能和相互关系、邮书传递方式、汉朝与羌族及西域各国的关系等，在河西汉简中都有反映，其中有许多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新材料，如敦煌悬泉简中有《康居王使者册》、《归义羌人名籍》、《案归何巫言驴掌谋反册》等，即为其例。在悬泉置汉简中不仅记载了西域都护所属诸国，而且还有西域都护以外的中亚各国与汉朝的往来情况，其中祭越、钩眷、披垣三国不见于传世文献。此外，河西简牍中还有很多比文献记载更为详细、具体的材料。如边塞地区在太守、都尉以下，还设有候官（长官为候）、部（长官为候长）、燧（长官为燧长）等，构成了严密完整的边塞防御和组织管理系统；驿、置、邮、亭等边塞邮驿机构虽带有军事性质，但又不同于长城烽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系统，在行政体制上受所在郡县两级政府领导。尤其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大量传置文书的发现，为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其中许多行政公文的相关记载，不仅对于说明长期以来史学界颇有争议的乡亭里的性质、作用及相互关系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而且对了解乡里的设置，特别是河西四郡各县乡里的建置增加了新资料。敦煌悬泉所出西汉武、昭时期的纸文书见有药名“薰力”。有研究表明，“薰力”即“薰陆”，是一种外来药，主要用于止痛长肉、调气活血和治跌打损伤。传世文献对该药的最早记载见于魏晋时期佚名撰《名医别录》，悬泉纸文书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西汉早期“薰力（陆）”就从西域输入我国，药物的流通输入也是当时对外交流和对外贸易的内容之一，“外来药输入史看来应当重写”。<sup>[21]</sup>

第三，利用简牍材料，有助于解决疑而未决的历史悬案，使许多千古之谜得以重解。如关于汉代玉门候官治所及其管辖范围，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致的结论。利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大量有关玉门候官的各种官文书，基本上可以断定马

圈湾烽燧遗址即汉玉门候官治所。其管辖范围东起显明燧西至仓亭燧，东西直线距离约34公里，现存烽燧17座；南自小方盘城北至南湖墩墩山，南北直线距离约50公里，现存烽燧5座。关于玉门关址，更是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利用马圈湾所出简牍资料，大致可断定玉门关在临要燧东侧，即候官燧与临要燧之间。<sup>[10]</sup>

关于汉张掖郡属县骊靬是否因安置罗马战俘而设的问题，亦颇有争议，并一度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热点。居延和敦煌悬泉汉简的发现，为澄清这一历史悬案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新资料。研究表明，西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击败北匈奴郅支单于在建昭3年（前36年），罗马军队与波斯人的卡尔莱战役发生在甘露元年（前53年），但简牍资料则显示，骊靬县早在神爵2年（前60年）以前就已设立。由此足证骊靬县之设与所谓安置罗马战俘毫无关系。<sup>[22]、[23]（p222-229）</sup>

还有关于汉代边郡农都尉的设置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但根据新出悬泉汉简中“神爵二年……使领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郡农都尉”（91DXT0309③4）和“十一月丁巳，中郎安意使领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郡农田官，常平余调，均钱谷，以大司农丞印封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郡太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II 90DXT0114②293）的记载来看，至迟在汉宣帝神爵初，河西五郡均已设置了“农都尉”等“农田官”。

第四，河西简牍为研究汉代特别是河西的科技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在武威、敦煌和居延汉简中，有大量历谱、医方、九九术和日书等资料，在敦煌悬泉汉简中还发现有葬书。其中武威旱滩坡汉墓中发现的一批医简，保存了30多个比较完整的医方，所列药物约百味。简文内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还有针灸记录。这些医简大多是当地医疗实践的记录，有些则是从同时代其它医书中抄来的方剂。这说明，内地传统的医学知识已在河西广泛传播和应用，医学人才也已崭露头角。<sup>[24]</sup>罗振玉先生对敦煌汉简“九九术”残简的研究则证实，乘法术始于九九而迄于一一，故称“九九术”。初为“二三而六、二二而四、一一而一”的形式，后来才改为自“一一如一”始而至“九九八十一”终。“改‘而’作‘如’始于宋代也。《孙子算经》亦作‘二二如四’、‘三三如九’，殆唐以后刊本所追改，非原书之旧矣。”<sup>[18]（p92-93）</sup>居延和敦煌汉简中的很多医方是关于兽医学方面的。所有这些，都为研究汉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至于日书，虽然存在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它却形成了一个

复杂而庞大的文化体系,记录了人们对天地、宇宙、社会和人类本身等的认识过程,对于研究和认识汉代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价值。

第五,河西简牍为研究汉代简牍制度提供了实例和原型。汉代简牍有特定的制度。由于文书的性质和重要性不同,简牍所用的材质、长短、宽窄、书写格式、编连形制等也有别。如简牍的刻齿,往往见于与时间和数字有关的文书中,而且都是涉及非常重要或需要保密的事件。居延和敦煌等地所出汉简中提供的大量翔实材料,为研究解决刻齿形式、内涵、性质和种类等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对此,罗振玉、王国维、劳榦、陈梦家、陈直、李均明等众多学者都作了大量探讨。如对觚的形制,向来众说纷纭。应劭认为觚为八棱有隅之木,颜师古认为觚形或六面或八面,徐锴则认为三棱为觚,也有释觚为方者,罗振玉先生根据敦煌所出觚的实物,对照汉画像石等资料,断定觚初由方剖分为二,故为“三面之中二狭而一广,又观觚上有穿,明为联属之用。”“方”又可训为“并”,“盖并则为方,析则为觚,本是一物,然不由目验,则千余年之疑未由取决也。”<sup>[18](p80-81)</sup>不过,就敦煌、居延等地所出觚的实物来看,既有两面、三面、四面者,也有五棱、六棱以至七棱、八棱者,而其长度则自20多厘米到近90厘米不等。王国维先生曾据文献记载,在《简牍检署考》一文中论述简牍之制云:“常牍之广,大抵三分其袤而有其一。”但对照敦煌、居延所出简牍实物来看,其长度受到材料、加工工具、书写习惯乃至使用者社会地位的制约。简牍长度多在14厘米至88厘米之间,用于书写典籍及文书的简牍多为23厘米左右,符、封检、木牋通常较简牍为短,其长短大小也不一致。可知简牍之宽狭,并无固定的程式,而是因人、因事而异。<sup>[4](p137-141)</sup>还有,如日本学者初山明就是通过对汉简材料的长期研究,解决了表示数字的券书刻齿的释读问题。从河西汉简中许多表示出入、取予钱物粮食的合同券书的形制来看,那些一式两份或多份的文书的分割(即破别)方式除了左右各写一份文字相同的文书然后对剖外,还有在正背两面书写相同的文字后从侧面劈分的,这在居延和敦煌汉简中均有反映。其中敦煌汉简中就有在正背面对剖后,故意留下劈开时凹凸不平的痕迹的木简实例。如需查验真伪,正背相对,如合符契。正是由于借助这些实物材料,才得以认识其破别方式,改变了以往在简牍整理中只注重简面文字,而极少留意简背、简侧的形态特点和变化的倾向,从而更有利于对简文内容的正确理解和简牍制度的深入研究。<sup>[25]</sup>

第六,河西简牍作为汉晋时期的墨书真迹,为研究汉晋时期文字和书体的渊源流变提供了实物证据。敦煌、居延等地所出简帛内容,许多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参证。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俗体字、通假字和省别字,是研究古文字、古汉语的难得资料,对于研究古音韵学也有可借鉴之处。通过简帛文字与文献对照比勘,不仅可纠正文献中的某些错误,也可了解文字的假借替代与书体变化情况。如罗振玉就通过对敦煌所出《急就篇》残简的研究,发现汉代有以别字代正字者,也有以“同音相假借”者,进而得出结论:“由是观之,知古人写字,多随意用世俗通行之字,虽字书且然,不似后人点画之严矣。”书法研究以墨迹为主,河西各地的汉简文字作为最早的墨迹之一,更是研究书法历史和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关于我国书体的形成与演变,传统认为章草始于汉章帝,但罗振玉发现在敦煌所出以章草书写的汉简中,则有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和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的纪年简,可知此前已出现章草。在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简中有楷体之迹,至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简中已楷七而隶三,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简中已全为楷书。由此看来,“昔人疑钟太傅诸贴为传樛失真或贗作者,以此卷证之,确知其不然也。”就书体而言,秦灭六国后,统一文字,公文书写用隶书,但在敦煌等地出土的西汉简中,仍然发现有用篆书文字或偏旁者,足证汉代“隶法尚未备也。”<sup>[18](p79-80), (p240-241), (p215-216)</sup>从云梦秦简和银雀山汉简的笔法来看,秦及西汉前期的隶书确实还不成熟稳定,结体很不方整,无明显的波势和挑法,但在西汉中期以后的河西汉简中,原来带有篆书遗意的古隶已发展为波势、挑法具备的成熟的分书(今隶),并呈现出众多流派,而且在同一文书中往往是篆、隶、草诸体混杂并用。河西汉简中的书体主要有小篆、古隶、汉隶、草书、行书和真(楷)书六大类。除少量小篆和古隶外,绝大多数是从古隶演变而来的汉隶、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和各种变化中的过渡性书体,真实地再现了汉代书体孕育、变革和发展的过程。其中草书主要用于低级官文书和一般奏牍的草稿,其用笔和结体已呈现章草的特点,为后世章草的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虽然西汉时的真书还不成熟,在汉简中也不多见,但真书的萌芽,为魏晋两代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综观竹木简书法,不仅使我们窥见到书体演变的历史痕迹,同时也使我们领略到简牍书体的艺术特色。突出表现了汉代书艺简练、率意、奔放的书法意境。”<sup>[26],[27]</sup>

## 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5XZS010）和甘肃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编号0509-05）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①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所获简牍释文》（载《文物》1991年第8期）作137枚，李均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6页在介绍“敦煌后期汉简”时，亦作137枚。但何双全先生认为《文物》1991年第8期所载释文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吴骧、李永良、马建华校释《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二书收录时均有遗漏，且出土地点和时间错乱，释文也欠妥。说见何双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35页。故此处采用后说。

②学者论及河西简牍学术价值者颇多。相关研究可参阅《甘肃汉简的学术价值》（见薛英群等编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锴《甘肃简牍述论》（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和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载2000年1月5日《光明日报》）等文。

③本简见《流沙坠简》之“术数类”，《敦煌汉简释文》中标号为1691。其中的两处“舍”字，二书均作“害”；“小时并在东方”之“并”字，二书皆作“丑”字，裘锡圭先生改作今释，细审图版，当以裘释为是。此外，对于“舍”字之释读，饶宗颐先生已经指出：“‘害’字应作‘舍’，‘舍’为天文上用词，《淮南子·天文训》有所谓‘阴阳刑德七舍’是其比。”说见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5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版，第451页。

## 参考文献：

- [1] 谢桂华，沈颂金，郭文玲. 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J]. 历史研究, 2003, (6).
- [2] 李永良. 河西汉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A].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牍学研究第一辑[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 [3] 马今洪. 简帛发现与研究[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4] 李均明. 古代简牍[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5]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J]. 考古，1960, (5).
- [6] 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J]. 考古，

1960, (8).

- [7]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J]. 考古，1960, (9).
- [8] 武威县博物馆. 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A].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 汉简研究文集[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 [9]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 武威旱滩坡汉墓发掘简报——出土大批医药简牍[J]. 文物，1973, (12).
- [10]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1981, (10).
- [11] 敦煌县文化馆. 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A].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 汉简研究文集[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 [12] 永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3] 王锴. 武威汉简本《仪礼》与“十三经”本《仪礼》比较研究[J]. 社科纵横，1994, (3).
- [14] 沈文倬. 汉简《服传》考[J]. 文史，1985, (24)、(25).
- [15] 裘锡圭. 考古发现德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A]. 裘锡圭自选集[C].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 [16] 陈其猷. 韩非子集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17] 《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标点. 墨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8] 罗振玉、王国维，编著. 流沙坠简[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9] 劳. 居延汉简考证[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
- [20] 俞伟超. 略释汉代狱辞文书——一份治狱材料初探[J]. 文物，1978, (1).
- [21] 张显成. 简帛文献学通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2] 刘光华，谢玉杰. 骊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 (2).
- [23] 胡平生，张德芳.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4] 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 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J]. 文物，1973, (12).
- [25] 胡平生. 木简券书破别形式述略[A]. 简牍学研究第二辑[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 [26] 黎泉. 简牍书体浅析[A].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 汉简研究文集[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 [27] 秋子. 甘肃汉简中的书体[N]. 甘肃日报，2003-5-23.

[责任编辑：朱耀善]